

COMPLEX CONSTRUCTIVISM The Evolution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复合建构主义

——
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

董青岭◎著

【国际观察的互补原理】

时事出版社

复合建构主义

COMPLEX CONSTRUCTIVISM

The Evolution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董青岭◎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董青岭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2.7

ISBN 978-7-80232-548-7

I. ①复… II. ①董…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308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100093

发行热线：(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010) 61157595

传 真：(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5 字数：284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秦亚青

一

董青岭博士的这本著作要讲述的是中式思维在国际关系运行和研究中的应用，即互补共生与过程建构。“阴阳相生”是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看作是对西方二元分立哲学的一种批评和挑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运行都被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和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所左右。在这种二元分立哲学下，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很容易被划分为两两相对的论题，譬如存在与非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性、归纳与分析、自我与他者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命题往往无法自我证成，也无法相互证否。在现实决策和经验分析中，我们已习惯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简化世界方法，以至于在日常实践中，我们不自觉地建立起一个二元疏离的世界，而我们的思维则不停地在寻求分立的平衡感和平衡产生的美感。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种分立思想在西方理论构建中尤甚，譬如，“国际/国内”的二元分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就是这种二元分立：国内政治有权威、政府，而国际政治无权威、无政府，以至于无政府状态几乎成了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公式和逻辑起点。虽然对无政府状态的含义理解有所不同，但这些理论普遍假定了牛顿力学原则之于该状态下问题解决的启发意义，即力的平衡与约束。迄今为

止，西方战略家和理论家所能够想到的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大致有三种：权力均衡、集体安全与世界政府。18、19世纪，自强或结盟或抗衡是西方各国战略文化的主导层面；进入20世纪，面对集团对峙而引发两次世界大战，各国转而寻求建立区域或全球性权力控制安排，先是国联，而后联合国、北约和欧盟，所有这些和平方案的设计，无论其形式多么千变万幻、新颖别致，均未超脱牛顿世界观的机械力学范畴。透过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特别是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了一个“原子世界”。在这个“原子世界”里，各个国家是分立的实体，彼此之间基于力学原则而互动。

再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疏离。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自我和他者通常被描述成彼此分立且对立的实体，有时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被单向性地想象成一种生存意义上的“零和竞争”关系。例如：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刻画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对抗，而以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倡导被压迫者、被遗忘者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当然，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对立的言说，当属德国政治学家施密特和美国学者亨廷顿最为世人所知。前者指出，一切政治的真谛在于区分敌友，无政府状态总是内生于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划分，任何一个自我身份的形成都必然是排他性的，即自我通过贬抑、排斥他者并将他者标定为“敌人”或“对手”，从而获得自我身份之确立；后者则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的疏离极易建构群体间冲突，一旦陷入不仅难以摆脱而且兼具进化性质：先是文明断裂带之间的对抗，然后蔓延至由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发展成为“亲缘文明集团”之间的战争。凡此种种，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思维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二

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20世纪提出，国际关系学实际上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是美国理论。我国也有多位

学者论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和美国特性问题，在更广义的视野下，无论是美国学派、英国学派还是欧陆学派，都有着明显的二元分立的基础，以自然与社会、物质与观念、结构与施动者、建构与解构、解释与理解等对立命题进行理论构建，于是便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内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长期对立与持久论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带入一个二元对立、冲突矛盾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可能是我们实现理论突破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本书的努力方向大致于此。它则指出，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理念和历史文化积淀的二元互补思维，可超脱于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哲学传统之外，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视角和人文关怀重新审视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人人为的二元疏离世界。本书所要试图表达的是中式辩证法与西式辩证法有极大的不同。西式辩证法注重实体思维，是对世界的分离性想象与建构，人自身的存在被不自觉地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人之于这个观察世界的价值不是被忽视、遗忘就是被遮蔽在工具主义的物化影响之下；而中式辩证法则强调过程建构、阴阳互生、天地同在，是一种关于世界以及人本身存立的互容互补思维，在互容互补思维下，“天人合一”，主观不是对立在“客观”之外，人只有在与自然、在周边世界同体共存的情况下，人才能最终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思维强调互补共生与过程建构。互补的概念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得即失”、“非生即死”的线性零和思维，而是一种“A可以非A”、“在与非在共存”的过程流变思维。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过程与行为体共生共存、相互建构，对立的二元命题总是共存于同一过程之中并相互容纳、相互转化。有关这一中式思维的形象表述就是太极阴阳图：阴阳互逐、互动互补、同圆共体；世上既无孤阳，也无孤阴，物质与观念相互影响、过程与行为体相互建构。显而易见，这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工具因果思维，而

是一种圆的整体演变启示。这意味着，在国际社会里，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过程而天马行空，也没有任何过程可以没有国家而以空中楼阁的形式存在。同理，物质与观念、主观与客观、激情与理性、自我与他者也不应当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这些对立的命题是自体共存的。

三

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上是延续了正题反题互诘的创生之路，各派理论之间各执一端、各持一词，相互争论不已；偶有中间道路型的理论建构，譬如希尔和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常为各派所不容、遭受各派抨击和指责。然而，在东方的思维体系当中，“执两用中”却是理论创生的常态，各派之间虽也有互攻互诘，但很少像西方那样建立起截然对立的理论形态。就此而言，董青岭博士力倡建构主义与不同政治世界观之融合，是一种东方式理论创生之路。以下几个观点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建构主义不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是将其进一步还原上升到形而上的元理论层面，强调建构主义是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并立的社会分析方法，是用以指导理论构建的理论而不是阐释国际政治运行的理论。它如同理性主义一样可以贯穿于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分析，可以和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而形成不同的国际政治之见解，譬如与自由理想主义相结合形成自由建构主义，也可以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形成现实建构主义。

其次，长期盛行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体系方法需要被重新审视，“结构”的概念也需要在互补原则下重新被理解。按照“阴阳相逐、互补共生、共体共存”的中式互补理念，该书强调了国际关系行为体所置身于其中并在其中运行的体系结构是一种复合结构，是物质与观念在具体历史时空下的自体共存与相互建构。在大部分国际关系状态下，物质与观念合二为一，共同发挥作用且二者之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时而因果约束、时而社会建构，或兼而有之；只是

“一”的概念与形式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状态也朝向不同方向而演变，或进化冲突、或进化合作。

再次，进程是国际关系的存在形态，是极其重要的分析层次，但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尽管西方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献，至今仍在探讨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温特也走向了“互构论”，但这些理论创见都没有最终超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藩篱之外。进而，该书强调，无论是结构还是施动者，二者皆存在于过程之中并因过程而具有实际意义；过程是不断流变和不断进化的，但过程并非总是进步的，有时它具有可逆性，而决定体系进程究竟是朝向进化冲突还是朝向进化合作演进，关键取决于复合结构之于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如何。

最后，施动性和人的意义应当被重新发现、重视和带回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国际关系应当回复到对人以及人类群体间互动的分析。就此而言，国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是关于人际关系和人的能动性的研究，人对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理解不应当被忽视，施动性也不应当仅仅给予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既是结构又是行为体的“结构化施动者”或“施动性结构”，这类行为体的意图、能力和活动方式也应当被关注。

简言之，这本著作讲述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互补原理，讨论理论的融合与分化，也在寻求理论对话的空间，其学术追求和理论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董青岭博士是我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他读书很勤奋，也很善于思考，理论思考是他的长项。毕业之后，我一直很关注他的学术研究，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他写的东西，我还可能问问他为什么最近没有看到他的论文。如今，他的专著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也希望所有的学生们能够以充满创新活力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

目 录

自 序	(1)
前 言	(17)
第一节 偏好何以被塑造和改变?	(18)
第二节 建构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吗?	(24)
第三节 主要观点与框架设计	(32)

第一部分 理论架构

第一章 偏好的形成与改变	(41)
第一节 偏好是相同且不变的吗?	(41)
第二节 主流建构主义的自由主义偏见	(49)
第三节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从对立到融合	(54)
第二章 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的分化	(91)
第一节 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 ——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还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 ...	(92)
第二节 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如何相互区分为竞争性范式?	(98)
第三节 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 ——建构主义身份政治的两种不同逻辑	(104)

第三章 复合建构主义:进化选择与国家社会化	(112)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他者”与政治身份之界定	(112)
第二节 主流制度理论和规范理论的进化取向	(116)
第三节 选择性社会化:过程演进与体系进化	(120)
第四节 复合结构:探索冲突与合作的关键性社会条件	(125)
第五节 分析层次:结构、进程与施动性	(136)

第二部分 个案研究

第四章 春秋无义战	(151)
第一节 结构的衰落与冲突的起源	(151)
第二节 分离性偏好与效率竞争型社会化	(157)
第三节 儒墨“天下”之争与秩序的重建	(164)
第五章 欧洲政治进程转轨	(177)
第一节 从纷争到合作:欧洲国际关系进程的转轨	(177)
第二节 控制暴力与合作的开端:欧洲聚合性认同的形成	(183)
第三节 社会化国家与欧洲合作:欧洲政治的欧盟化	(200)
第六章 达尔富尔危机	(208)
第一节 从朋友到敌人:身份的疏离	(208)
第二节 国家失能与暴力失控:冲突的蔓延	(212)
第三节 掌控暴力与社会化族群:重建国内和平	(222)
第七章 结语	(229)
参考文献	(238)
后 记	(266)

自序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强势盛行，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实际运行多为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所浸染，以至于我们所置身于其中并在其中活动的这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二元身份疏离且斗争冲突不断的世界。而如今随着量子政治思维的兴起和古老东方互补哲学的再发现，无论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人员还是对政策界人士而言，国际观察或可超脱于“二元对立”之外。一种有别于西方分析哲学的“二元互补”思维或许不会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从这个凌乱、冲突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未来国际关系的运行提供一种别样的分析视角。



近来，在国际关系领域，有关过程和过程建构的讨论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 20 世纪之初那场席卷物理学领域的量子革命。当时以海森堡和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人们之于物理对象的观察和描述遵循着“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则”。^①一时间，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人们所熟悉的二元分立

^① 测不准原理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由海森堡提出，该原理揭示了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粒子在客观上不能同时具有确定的坐标位置及相应的动量；而互补原理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则是玻尔为了解释量子现象的主要特征——波粒二象性而提出的哲学原理，认为微观粒子同时具有波动性与粒子性。而这两个性质是相互排斥的，不能用一种统一的图像去完整地描述量子现象，但波动性与粒子性对于描述量子现象又是缺一不可的，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对量子现象的完备描述，量子现象必须用这种既互斥又互补的方式来描述。在渊源关系上，互补原理是对测不准原理的哲学解释，二者并称为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两大支柱。

哲学和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受到颠覆性冲击。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描述这一物理学革命时说：“旧的唯物论死亡了；而甚至一度取代物质微粒的电子，也已变成了失落肉体的灵魂：只不过是波动形式而已，甚至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空间中之波，也不是麦克斯韦的以太中之波，而是用我们的意识所不能领悟的措词来描述的四维时空中之波，或概率图式中之波。”^①而物理学家戴维斯则认为：“量子论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思想，使人得以洞察精神以及外在世界的本质。”^②诸如此类的评说足可见量子互补思想对当时科学界的影响。而今天，过程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关系本位及其所蕴含的中式辩证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起到了类似的思想冲击效应，使得国内外的政策研究者和战略决策者不得不慎思一种超脱于“二元对立”之外的互补思维之于国际观察的重要性。

就此而言，本书认为，作为社会科学谱系中新近才发展成形的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学更是深陷于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世界观的影响之中：“国际/国内”二元分立是西方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基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疏离是西方国际关系思维的主导特征；寻求基于实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因果解释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旨趣。虽然最近一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围绕着本体论和认识论而展开，但辩论的结果至今没有解决好“物质与理念谁更重要”、“结构与施动者谁更优先”以及“理解和解释谁是更适宜的研究方法”等问题，^③仿物理学因果解释进行经验观察和规律总结仍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旨趣。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

① [英] W. 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页。转引自王萌：《佛教与科学的当代对话——以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为线索》，《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2期，第20页。

② [英] 保罗·戴维斯著：《上帝与新物理学》，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转引自王萌：《佛教与科学的当代对话——以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为线索》，《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2期，第20页。

③ 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第三次大辩论，可参见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p. 611–625; Tanja E Aalberts, Rens Van Munster, “From Wendt to Kuhn: Reviving the ‘Third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6, 2008, pp. 720–746;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35–254.

“社会学转向”^①以及“复杂系统理论”的兴起,^②基于国际关系“原子论”主张的还原主义解释开始备受冲击和挑战。^③还原主义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然后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也就是说,在还原主义看来,各种现象均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孤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然而量子论的崛起和复杂科学的诞生却说明,还原主义的解释不仅割裂了人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还忽略了行为体的能动性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最终朝向线性思维和机械的决定论主张。^④直至最近,当温特宣布“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时”,^⑤其欧洲的批评者们认为“温特已经和他的批评对象们处于同一阵营了”,^⑥决定主义和确定性分析已然侵入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

概而言之,在这种“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浸润下,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世界通常被划分为两两相对的论题,譬如进步与落后、文

① Robert Hariman, *Post-Realism: 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p. 324–348; 袁正清著:《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vid Byrne,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③ 有关还原主义的批判可参见 David Alberts and Thomas Czerwinski, eds., *Complexity, Glob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1997; Fred Hallida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new reductionism?” In M. Ebata and B. Neufeld, eds., *Confronting the Politica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 Basingstoke, 2000, pp. 47–71;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④ Alexander Wendt, “Flatland: Quantum Mi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Hologram,” in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Palgrave, 2010, pp. 279–310.

⑤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⑥ Stefano Guzzini, and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民主与威权、开放与封闭、自我与他者、敌人与朋友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命题往往无法自我证成，也无法相互证否，以至于在日常实践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这种“二元分立”的方式简化对这个纷繁芜杂世界的认知，整个世界日益朝向二元疏离的状态演进，而我们的思维则不停地在以牛顿经典力学平衡原则来寻求分立的平衡感，譬如两极稳定和大国势力均衡等。

二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以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迷恋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组成部分并不足以引导我们理解整体。1991年，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奥多·贝克尔（Theodore L. Becker）在其编著的《量子政治学：量子理论的政治应用》一书中如是写道：“旧的政治运行连同政治科学太过附着于牛顿物理学的启示。而如今随着整个科学界正在远离机械论、原子论和决定主义转而追求新的世界认知范式，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到了不得不如此跟进的时候了。”^①为此，他组织了一个九人政治专家小组进行“思想实验”，以求能够凭借量子启示超脱于牛顿世界观的政治思考之外。1996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John Horgen）则更加不无激进地总结道：“在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下，科学已近终结”；“有关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来自哪里知识探索，已经进入一个报偿递减时代”；“将来的研究已不会有多少重大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除非我们拥有新的世界观的指导”。^②

显而易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有关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应照搬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这已为诸多国际关系文献所阐述。然而，若要放眼当前的国际政治运行和国际关系研究，二元分立的简单世界划分、线性工具主义的还原解释以及源自牛顿经典力学的平衡原则仍是我们目

① Theodore L. Becker, ed., *Quantum Politics: Applying Quantum Theory to Political Phenomena*, New York: Praeger, 1991.

② [美] 约翰·霍根著：《科学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

前的主导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兴起，以原子论和决定论为核心立场的二元分析哲学已然遭受严重质疑和批判，整个世界连同我们人类自身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充满能动性且不可还原的有机整体。保罗·戴维斯和朱利安·布朗指出：“在量子世界观的指引下，外在世界的存在不再是独立和孤立的，而是再也无法摆脱的与我们对它的感知纠缠在一起。”^①

概言之，还原主义、机械论以及二元分立哲学能否继续指引我们认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人类自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范式革命问题。恩格斯在1876—1878年间写就的《反杜林论》中写道：“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②然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正呈现如下变革：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从客体思维进入主体思维；从单向思维进入多向思维；从静态直观思维进入动态变革思维。^③可以说，我们所处时代远不是“科学的终结”，而是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甚至超越于“二元分立”思想的新的世界认知方式。^④

对此，有不少学者指出，以强调整体演进、对立统一和不确定性、复杂性为特征的“二元互补”哲学，或许能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新的见解。^⑤在《过程建构与关系本位：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研究》^⑥一文

① [英] 保罗·戴维斯、[英] 朱利安·布朗编著：《原子中的幽灵》，湖南：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

② [德] 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页。

③ 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的变革方式”，《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第4页。

④ [比] 普里高津著：《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

⑤ Liu Xiaogan, ‘Taoism’, in Arvind Sharma (ed.), *Our Religio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pp. 229–289;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China*,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1999; Daniel A. Bell, “Just War and Confucian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Daniel A. Bell, ed.,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6–257; Amitav Acharya,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Taylor & Francis, 2009.

⑥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中，秦亚青先生强调，中西学者之于国际关系思考皆可有其自身的独特视角，中式辩证法与西式辩证法存有大不同。西式辩证法注重实体思维，是对世界的分离性想象与建构，人自身的存在被不自觉地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人之于这个观察世界的价值不是被忽视、遗忘就是被遮蔽在工具主义的物化影响之下；而中式辩证法则强调过程建构、阴阳互生、祸福相依，是一种关于世界以及人本身存立的互容互补思维，在互容互补思维下，“天人合一”，主观不是对立在“客观”之外，人只有在与自然、与周边世界同体共存的情况下，人才能最终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就此而言，中式互补概念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得即失”、“非生即死”的线性零和思维，而是一种“A可以非A”、“在与非在共存”的过程流变思维，其核心理念是互补共生与过程建构，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工具思维和理性因果思维，而是一种圆的存在与整体演变启示。如果二元分立思维和机械原子论可广泛用之于国际关系研究，那么作为一种与之长期相对立的整体互补思维和过程演化理念是否同样有助于我们的国际观察呢？如果这样一种互补原则确实可用于我们的国际研究，那么其具体的理论形态和应用模式又将是怎样的呢？换言之，在“二元对立”原则之外，如何以“二元互补”原则进行理论构建和政策阐释，这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宗旨和研究兴趣所在。

有关中式互补思维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研究的启示，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就曾指出，在过去2500年中，人类科学与文明始终存在着相互独立的两大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思想内核是机械还原论，后者的思想内核是互补整体论。进而，他强调：“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阔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服从于其自身的内在支配。”^①东西方思维犹如两辆并行的思维列车，前一辆列车长期遮蔽了后一辆列车的的光芒；而如今，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瓶颈，新科学的崛起则与古老东方思维的互补理念不谋而合。^②

① 姜岩、朱清时著：《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英]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三

如何将互补理念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以超脱于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之外？进而体现互补原则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态又将是怎样的？如何以一种学界通行的语言来表述这些不同于西方常规思维的观察视角，换言之，如何使这些互补理念为国内和西方学界所接受，将是本书写作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为此，本书将寻求用现代标准的国际关系语言来阐释西方量子理论和东方互补理念的精神相通之处，而不是简单套用、照搬量子术语和阴阳哲学于国际问题研究。

本书的立论基础是：阴阳互逐、二元互补、同体共生。尼尔斯·玻尔的量子理论指出，波粒二象性是物质的本来存在形态，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无法将我们的主观意识排除在外；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可还原、可分割的机械原子论世界，而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量子纠缠世界，以致于我们对某一现象的解释通常会用到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一对属性概念，譬如粒子概念和波概念。^①而源自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互补理念，则同样强调阴阳是所有事物的自身性质而不是事物自身，在有关事物的性质表述上，绝对不存在分裂对立的孤阴、孤阳现象，阴阳不是形式互补关系，而是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质。^②就此而言，互补理念与传统分析哲学强调二元疏离、矛盾冲突不同，它主张二元同体共存、对立统一。本书认为，这一思想及于当前的国际观察而言，具有概念重构和理论重建之意义。

1. “结构”的再定义：物质与观念的同体共存

按照西方二元分立哲学，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划分为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两大阵营，且两大范式之间因核心立场的不同而存在理论上的相互攻讦。物质主义认为，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性特征主要是指以经济和军

① [英] 曼吉特·库马尔著：《量子理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世界本质的伟大论战》，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吴全兰：“阴阳学说的哲学意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55—58页。